

# 罗荣桓与罗生特 超越国界的友谊

抗战期间，奥地利医师罗生特来到中国，曾先后担任新四军总部医院卫生顾问和八路军山东军区卫生顾问，并在陈毅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革命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经他救治的抗日军民数不胜数，其中包括罗荣桓等多位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在艰难的岁月里，罗生特不仅成功稳定住了罗荣桓的病情，还同罗荣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 据《人民政协报》



罗荣桓(左三)和罗生特(左二)在山东抗日前线

(沈其震把雅各布·罗森菲尔德的名字改为罗生特)。受到了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及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随后，罗生特被安排在新四军总部医院工作并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在新四军期间，罗生特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往返于军部和各部队之间检查卫生工作、培训医护人员、看病问诊、实施手术。根据他的建议和筹划，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成立，罗生特多次授课培养了大批卫生骨干。

1942年冬，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罗荣桓积劳成疾，军区医院虽给予多方治疗，但并没有取得效果。陈毅得知情况后，建议罗荣桓到新四军军部医院找罗生特大夫诊治。经过罗生特精心治疗，罗荣桓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在治病期间，罗生特每天都多次来到罗荣桓身边，摸脉搏、查尿样、测体温、量血压，详细询问病人感受，掌握治疗进展情况。罗生特的良好医德风范，给罗荣桓及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工作需要，罗荣桓在新四军四师驻地、军部医院经罗生特治疗两个月后，不得不北上回到山东。

1943年秋，罗荣桓的病情再度转重。当时，罗生特正在四师师部工作，陈毅打电报给彭雪枫师长，请他征询罗生特的意见，问其“能否去山东工作，以后有机会再去延安”。罗生特欣然同意。很快，罗生特带着几个助手，风尘仆仆赶到山东。

罗生特一到，立即对罗荣桓进行全面、详细的检查、化验，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仍未能确定病因。罗生特建议罗荣桓秘密到上海治疗。经党中央同意，罗生特护送罗荣桓由山东行进至盐阜地区时，得到消息说，罗荣桓此行到上海就医有暴露的危险！于是罗荣桓决定继续留在山东。经罗生特对罗荣桓进行保守治疗，病情得到控制。

罗荣桓对罗生特十分信任，积极配合治疗。在山东，罗荣桓还任命罗生特为军区卫生部顾问。除了给罗荣桓治疗外，山东根据地不少伤员和病患者也得到罗生特的治疗。

## 深厚友谊，宛如家人

罗生特性格开朗，爱好音乐，很喜欢小孩子。罗生特经常与罗荣桓家来往，孩子叫他“大鼻子叔叔”，他总是高兴地答应，并伴随着朗朗的笑声。

罗荣桓和军区领导都很关心罗生特的生活。每

当前线缴获到炼乳、咖啡、罐头等，罗荣桓总会派人送一些给罗生特。但是，罗生特不愿意搞特殊化，宁可与普通战士、群众一道吃高粱煎饼。

抗战胜利后，罗生特继续随罗荣桓所率部队一起转进至东北。为了给罗荣桓治病，罗生特带领相关人员跑遍了东北各城市的大小医院寻医问药，但都未能使他满意。后来，罗生特找到苏军驻旅大地区司令李皮辛斯基，向他提出请莫斯科派专家来华支援，给罗荣桓施行手术。

一个多月过去了，苏联方面专家没到，罗荣桓的病情却不断加重，罗生特极为焦虑。他前往民主联军总部，要求下令让罗荣桓休息，并提出罗荣桓应立即到苏联治疗。他焦急地表示：“如果罗荣桓不能到苏联做手术的话，在病情发展到不能再等待的时候，只好由我给他施行手术，但这种手术是危险的。”后来，终于等到苏联方面同意罗荣桓去莫斯科治病的消息，罗生特如释重负。

平津战役结束后，罗生特陪同罗荣桓到北京、天津医院做检查，罗生特自己也做了身体检查。检查结果表明，罗生特已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立即休养。其实，罗生特早知道自己病情，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一直忍受着心绞痛，长期带病工作。党中央和四野首长对罗生特的健康很关注，决定罗生特和罗荣桓一同留在天津治疗、休养。但是，罗生特考虑的始终是病人和工作，他多次去医院看望伤员，给首长做检查，到一些医院、大学参观、学习，做学术报告，还给很多同志做检查、治疗和手术。在天津，罗生特没有安心休养，还是和以前一样，每天给罗荣桓检查两次。

1949年，罗生特看到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便提出要回国看看。他对通讯员李光说：“我回国看看再来，还要把哥哥、弟弟、妹妹带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促进奥地利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做第一任驻华大使。”罗荣桓理解罗生特的心情，特设家宴招待罗生特，为他送别。宴会上，罗荣桓与罗生特深情交谈，宛如家人。

1949年11月，罗生特离开了他战斗、生活9年之久的中华大地，踏上了回国旅程。

两年后，海外传来罗生特因心脏病发作逝世的噩耗，罗荣桓及其家人以及罗生特的中国战友们悲痛万分，纷纷举行祭奠活动，悼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 精心治疗，病情控制

罗生特，本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1928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获得综合医学博士学位，于大学附属医院任住院医师。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后，大肆逮捕、迫害犹太人，罗生特也被关进集中营，受到残酷虐待。在遭受折磨一年后，罗生特侥幸获释，但立即被驱除出祖国，并被勒令永远不准回国。罗生特拖着病残的身体，偕同难友悲伤地离开祖国，来到中国上海。

在上海，罗生特开了家诊所。在沪期间，罗生特参加了外国人学习小组，学习马列著作和共产主义理论，其思想更加倾向进步。经外国记者郭希伯(汉斯·希伯)介绍，罗生特结识了新四军派驻上海采购药品、医疗器械的吴之理和军医处长沈其震。罗生特认为，中国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战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是抗战最坚决的力量，中国的希望在根据地、在共产党。

1941年3月，罗生特随沈其震等抵达苏北根据地

## 一场豆腐宴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一个艰苦的阶段。建阳县(现江苏省建湖县)县委县政府临时驻扎在长北滩，县委县政府机关设在王氏宗祠，工作人员住在长北滩群众家里。那时，干部群众是血肉相连的关系，亲密得像一家人。遇到紧急情况时，群众会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做掩护工作。为答谢长北滩人民的深情厚谊，县委县政府决定在除夕夜办几桌便饭，请各位“房东”来聚一聚。

当时建阳县成立不到半年，政府机关人员的给养十分不足，加上敌人对我根据地开始全面封锁，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办饭的菜肴，拿什么来宴请乡亲？正当县委书记金韬、县长唐君照为难之时，粮食科长虞廷松出了好主意，他说：“仓库内存有一坛子路墩糟坊产的地方酒，还有40多斤黄豆，这些都是知名人士杨幼樵老先生送来慰问县里同志的，一直未敢动用，现在可派上用场了，用黄豆做豆腐，用豆腐宴招待乡亲们，同样能热热闹闹。”

县委县政府赞同这一设想，随即向当时兼任中共苏北区委书记的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作了报告，黄克诚十分支持，并托县领导向乡亲们问新年好。得到批准后，县领导一边安排人浸豆子、磨豆浆、做豆腐；一边写春联、剪彩旗，张灯结彩，布置豆腐宴现场。

除夕下午，县领导亲自登门，请来了前庄后舍二十多位“房东”和几位农救会代表。待客人到齐就座后，炊事班开始上菜，全是豆腐“翻新”，有辣豆腐、焖豆腐、炸豆腐、豆腐羹、豆腐丸子、红烧萝卜豆腐、青

菜豆腐汤……

唐君照作了开场白。他首先向长北滩父老乡亲拜年，并传达了黄克诚对乡亲们的新年祝福。“感谢大家对县委、县政府工作的支持，战时无以待客，豆腐、水酒不成敬意。”他举起杯，请在座一齐干杯。

金韬一边敬酒，一边满怀歉意地说：“这里没有打百叶、做茶干的工具，只能在豆腐上做文章，让诸位见笑了。”席间，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称赞，都说县领导费心了，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支持政府抗日是应该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能吃到“白腊肉”(百姓对豆腐的美称)，就算有口福了。

宴会开始后不久，县总队副总队长郑贵卿带着胜利的喜悦推门而入，开口就向大家报告好消息，说是今天下午接到情报，得知西荡一伙土匪回马厂崔家楼老窝过年，我总队立即派出一支武装，配合一区队区队，包围了土匪窝，30名匪徒当场被捕，缴获快慢机、驳壳枪两支，白朗克手枪一支，子弹44发，我方无一伤亡。

大家听了拍手称快，连忙请郑贵卿入席，向他敬上一杯胜利酒。他又向在座回敬了一杯，这时群情振奋，大家兴高采烈，欢呼胜利，迎接新年。散席后，乡亲们回去就放鞭炮，祝贺新年大胜。紧接着，各家各户鞭炮齐鸣，长北滩人民迎来了新春。

七十多年过去了，长北滩这场别开生面的豆腐宴，至今仍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

□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 李政道的考卷

1946年春，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受政府委托，推荐两人到美国深造。在选定朱光亚后，另一名尚无法确定，他们便找到叶企孙。当时叶企孙是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而李政道此时正上大二。叶企孙与吴大猷一起破格选送李政道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留学做博士生。那年李政道才19岁，他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理人员无法置信，惊讶地说：“怎么会是个儿童？”

叶企孙是在上电磁学课时发现李政道已读过更深的电磁学书，就对他：“你不必上我的课，期终参加我的考试就可以了。但是，实验你一定要做，实验是很重要的。”后来在电磁学考试中，李政道的分数只有83分。其中理论部分60分，他得了58分；实验部分，由于他在做实验时不小心把珍贵的电流计悬丝弄断了，总分40分仅得了刚及格的25分。这件事充分地显示了叶企孙对学生既严格又关爱，而且慧眼识珠。李政道于1957年10月和杨振宁一道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说：“叶企孙改变了我的命运。”

几十年后，李政道仍记得叶企孙当时告诉他的话：“实验不行，理论再好，也不可给100分。”正是恩师的谆谆教诲和严格要求，使得李政道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孜孜以求，攀上了科学的峰巅。而叶企孙一直珍藏着那份电磁学考卷，直到他去世后多年，亲属才发现当年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的那份答卷。

□ 据《人民政协报》